

實驗書寫

《文化研究》第三十五期（2022年秋季）：318-325

「我們不碎」：周耀輝歌詞班的社群實踐* Creativity, Pedagogy, Community: Chow Yiu Fai's Lyrics Writing Course

周耀輝**
Yiu Fai CHOW

好久好久，都沒有在校園上課了。動筆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是2020年9月底，我剛跟學生真真實實可以靠五官而非繫一線地見面與溝通了，是在香港浸會大學的歌詞班上。

昨天最後的部分是五位同學做報告，所謂報告，是我給他們的創意練習，主題是：「快畢業了，還有什麼大學生活裡想做但未做的，做吧。」歌詞班的同學都是最後一年的同學，他們選了打邊爐，在校園裡打邊爐，尤其是幾乎一年沒有來校園，好想聚聚吃吃談談笑笑，誰知社運加上疫情之下的校園監控情況厲害，他們跑到某處，某處就有保安人員來叫他們散去。

終於，他們在課室裡啟動了無火的鍋。他們實踐得很有節制，很成熟，簡單而優雅地展示了他們在非常時期的尋常渴望，還一起創作了一首詞，就叫《火鍋》。

於我，這就是一種溫度，叫社群。

投稿日期：2020年11月19日。接受刊登日期：2020年12月4日。

* 感謝王智明，是他認為我可以寫歌詞班的，感謝他的信任。我也想感謝審委給我的回饋，讓我看到初稿的種種缺欠。感謝所有同學。文章定稿後，收到臺灣文化雜誌Verse邀稿，參與一個關於歌詞的專輯，我修改了一個比較簡短的版本發表（2021年七月號98-100頁）。

** 周耀輝，1989年發表第一首詞作，書寫歌詞及其他文字創作至今，曾獲多個詞作及其他文學獎項。1992年移居荷蘭。2011年獲阿姆斯特丹大學傳媒學院博士學位，回港加入浸會大學，現職人文及創作系教授。近年亦參與舞臺及視覺藝術創作。

以下，我想引用桑內特（Richard Sennett 2012）的著作《一起》（*Together*），去審視歌詞班。想到桑內特，感謝一位譯者，她在替我2019年出版的一本書做翻譯，關於上海做創意工作的單身女性（Chow 2019），其中一章聚焦於崑曲，和因此建立的社群，她們當中不少人都喜歡崑曲。桑內特是我主要的立論根據。譯者跟我是好朋友，她知道我在浸大的教務，就說：你的歌詞班也是這樣的一個社群啊。

教學是社群建立的方式。

因此，當我打算投稿「音樂的躁動」的時候，就想，這篇短短的文字，不如從這個角度探索一下我這幾年開展的音樂教育帶來怎樣的社群實踐，以及當中的政治。也是藉此替自己的一段歲月做個紀錄，做一段歷史的書寫。¹

2011年，我從阿姆斯特丹回到香港加入浸會大學，上司知道我做學術之前一早已開始寫歌詞，邀請我開辦歌詞班。²這樣的邀請，我偶然就會收到，但都是商業音樂學院的班。我一直沒有答應，是不敢，因為我怕人家花了學費就有期望，期望到課程完結就懂得寫詞甚至可以入行。在大學裡，假如我開班，只是本科一共128學分之中的3學分，我覺得可以。我覺得同學學寫詞就該跟學其他的種種同步，創作從來就該跟生活一起，音樂也一樣。³

-
- 1 有天，可能我會找來同學做訪談，或者邀請他們親自寫下對歌詞班的感受，或者寫一篇更「學術」的論文，或者其他，但暫時，這篇短文的目的比較簡單，就是我的紀錄與探索。
 - 2 第一屆學生當中的一位，叫王樂儀，她本科畢業後跟我讀碩士，現在在我的博士母校阿姆斯特丹大學唸博士，後來也開始寫詞，是我同行了。她本科畢業後就幫我辦理歌詞班。文中關於歌詞班的種種，有她很大很大的貢獻。我感謝樂儀一直扶持。
 - 3 歌詞班每一個學年開辦一次，為期一個學期，大約12至13節，每星期1節3小時，形式以工作坊為主，輔以短講，也有錄音室參觀，嘉賓分享，嘉賓都是在音樂圈工作的同事。由於是創作班，重分享交流，學生維持在30至35位，男女大致各半，絕大部分是畢業班學生，由於歌詞班是選修科，不同院系的本科生都有，人文及創作系、傳理系、中文系的學生總會佔了起碼一半吧，但其他「不特別文藝」的例如化學系、體育系、電腦系、工管系等的學生也有。雖然歌詞班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培育詞人入行，但多年來，我引薦的、學生自己爭取機會的，都陸續看到作品發表，除了上面提到的王樂儀以外，我知道的有8人。

讓我最終決定開班的，是我忽然明白教和導的分別。教，似乎是已經懂得了，就來傳授給學生；導，很不同啊，上道下寸，我跟學生分享我走過的道路，餘下的，就要靠自己的分寸了。我不懂教，我可以導。

當時，只是單純的虛懷，慢慢慢慢，從虛懷就多了明白並且衍生了平等以及自由。我知道，像我這樣的年紀，帶著老師以及資深詞人的身分，要批評學生，太容易了，但我一想起自己「入行」以至能夠留在行內30年的種種，會想到詞的好壞，但能不能入行以至留下來，太多都跟此無關。我常常跟學生說，假如我第一首寫的作品不是交給達明一派，當時不是八十年代末，這個世界很有可能不會出現我這位詞人。對自己的懷疑，我稱之為虛懷，而我懂的，是我懂的，有用，重要，但不是真理，跟我所經歷的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因此也就有了時空的限制。而我努力告訴同學我懂的，也好奇他們聽了之後的反應，尤其是這些在跟我不一樣時空之下長大的年輕人。

仗著時空差異掀動的虛懷，我努力脫離老師與學生之間的階級，以及相關的知識與權力結構。譬如，我會說：我不懂讀譜、我不是中文系的、對中文的興趣來得特別慢，小時候我甚至不特別聽音樂。我反覆地跟學生說：寫詞的手藝、創作，從無標準，都是我自己無師自通的，然後分享。無師，是我相信，人人都可能找到自己的一套方法。這，就是我經營的平等，而我希望學生假如因此感覺多了與我的親近，少一點畏懼，也許更能自由地，參與歌詞班，甚至做人。⁴

然後，我在每一屆的第一課，總會告訴同學幾個歌詞班的前提。

（一）我給他們的評語不是絕對，並非權威，而創作從來也沒有絕對，也不需權威；⁵（二）與此相關的是，世界喜歡評分高低，但其實非常主觀，帶著某種體制，創作本身的美好應該更純粹，所謂完滿，是完成的

⁴ 柯伊伯斯（Giseline Kuipers 2013）發表過一篇關於「懷疑」的論文。她把「懷疑」推為首要學術美德，認為學者必須對自己、對自己的觀察與詮釋都持懷疑態度，而懷疑也應該在大學教育裡佔重要位置。

⁵ 這一點，大體上就是我從福柯所學到的，關於權力、真理、知識。

滿足；⁶（三）歡迎同學問我以及所有同學任何問題，而所有人都有權不回答；（四）至於同學發出的問題，我不能確保有答案，但我可以確保認真對待；（五）外面的世界怎樣怎樣我管不了，但課室四面牆之內我會盡力讓我們開放自由；（六）每次上課，我就看作是我們的一次約會，希望隆重認真。末了，我也總會引用福柯（Michel Foucault 1974）的這句話：「老師能令教學變得不歡愉，不明亮，不性感，也真是成就！」作為自己的提醒。

重看這些前提，宏大地說，就是質疑體制、抗拒霸權、盡力的平等、盡力的自由，並共同建立我們所相信的。很久已來，這些都是文化研究的使命與鬥爭。但原來對我城90、00後的年輕人來說，真正宏大的，就是這一件事了，尤其是在越來越資本主義，越來越難平等自由的香港。今屆第一課之後，我收到一位同學的電郵，說：感謝你說了那些話。

桑內特對社群的討論，建基於童年時住在美國芝加哥貧民區的經驗，從中提煉出三個面向：鬥志、信念、合作。桑內特當時的鄰里很多都是被邊緣化的、受流氓威脅的人，必須群策群力才能建立安居之地，從這個角度來看，歌詞班與之不能相提並論，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歌詞班的年輕人不是也是憂心忡忡、前路茫茫嗎？我這樣說，絕對無意把彼城貧民區的具體情況抽象化、平面化、普世化，他們有他們特定的挑戰。我只想說，此城，貧富懸殊越來越激烈，這些年輕人從小聽到的權利越來越受剝削，然後出現社會運動，再有疫情，動盪之中，我們有我們的沮喪與嚮往。

在歌詞班的一段時間與空間裡，我們有很多的合作，從走進課室一起把桌椅重新安放、一起討論同學的作品、一起分組做文首所提到的練習，到課程完結後也一起籌辦畢業作品演出。但，最基本的合作，我認為，就是我們共建著我們所相信的，珍重的。

合作、信念，而我想集中談的是桑內特分析的第三面：鬥志，或說

⁶ 關於英才制（meritocracy）的批評，較新的可參看馬爾科維茨（Markovits 2019）及利特爾（Littler 2017）。

「在困難景況之中，怎樣維持自己的鬥志」（Sennett 2012: 248）。⁷對桑內特而言，信念是朝著遠方的，而鬥志就是當下的狀態。常見的是，我們都希冀著這樣那樣，可是，現實磨人，難在如何堅持下去，太易喪志了。信念如何堅強，鬥志可以薄弱。桑內特的鄰居看著自己的孩子都會想像未來更好，告訴自己未來必須更好，可是收入根本不夠，工作又不穩，失了鬥志，信念崩坍。

抑鬱，就是失了鬥志的體現，而桑內特引述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分析，說太多事太多人——我們的父母、兄弟姊妹、情人、友人、大人——太令我們失望了，我們憤怒，但輾轉之間卻把怒氣發在自己身上，對自己失望。責備自己總比追討世界容易吧。假如有一群人，一起哀悼過去，同時逃過懷舊的魔爪，或者可以逃到新生命。這是鄂蘭（Hannah Arendt）分別哀悼與懷舊的說法。

社群，如此這般維持著大家的鬥志。至少可能。

歌詞班裡，起初幾屆的同學常常借他們的作品表達對前途的徬徨，也許就是所謂新自由主義與中國傳統價值的霸權。浸會大學不是香港的所謂一線大學，學生的家庭背景大多屬於基層，而歌詞班同學都是畢業班同學，擔心畢業後的選擇，不能按著自己的信念。有同學說，父母已經預算她一畢業就要找安定的工作，把收入三分之一作為家用。有同學說，像他們這些人，不是輸在起跑線，是起跑線已經是他們的終點。

也有一些同學在上了好幾課之後，應該是多了信任，作品中流露了，分享時也表白了自己的「另類」情慾，同性、師生、偷窺，等等，往往也會記起一些霸凌的傷痛。有時是同學談到一些學者會歸類為異性戀霸權的東西，例如是否必須單一、必須結婚、必須做人家認為你必須做的男與女。我們借著作品談著談著，不一定有共識，起碼肯定了異同的存在、表達的自由。疫情時期我們上網課，有男同學不小心讓我們看到身旁有人，然後就介紹給我們認識，是他的男朋友。

7 關於信念、合作，希望有機會繼續思考，例如同學對成績/成就看法的改變，畢業作品演出的合作等。

這些年，我們繼續談著前途，談著性別政治，同時我感到更多不能名狀的憤怒，就是桑內特說的抑鬱，「看見到處正淌淚 / 才明白我們生於廢墟」，是我去年（2019）寫的一句歌詞。⁸上一屆也就是今年上半年上課的歌詞班，我們說過自殺、自殘、飲食失調、家暴，還有抑鬱。同學書寫歌詞悼念運動中失去的舊同學。疫情之中我們被逼留在家裡，因此也就多發生了家庭的種種不堪。例如目睹有人跳樓，不知道該怎樣抹走留在眼中的一切。當然也有一些相對簡單的負面情緒，例如擔心過年時如何跟政見不同的親人團年。我們一起為傳統賀年曲〈迎春花〉寫了新詞，心中念念有詞，或者可以安然度過。

關於抑鬱，我記得清楚的一次是這樣的。有個男生跟我們解釋他歌詞背景的時候，主動談到女朋友有抑鬱症，他覺得很辛苦。「啊，」我說，「難怪你上課的時候總是這樣頹頹的坐在椅上，彷彿隨時會掉下來的，負擔太重了。」他說，「是。」有同學問，「那麼你想過分手嗎？」他猶豫。另一位同學問，「如果她打你呢？你會離開嗎？」我問這位同學，「為什麼你這樣問？」他說，「我父母就是這樣，一方有抑鬱，一方在苦守，直到出現身體暴力。」學期末，分享歌詞的男生坐得精神了，他跟我們說，分手了。

當然，我得馬上補充，我懷疑不少同學不一定得到什麼激勵，就算在上課的時候重新得力，但下課之後呢？離開校園呢？在修改這篇文章的時候，一位畢業了的歌詞班同學，忽然跟我聯絡，抑鬱症又發作了。另一位更早畢業的同學在很長很長的沉靜之後發訊息給我，說：「點解人地撐到，我撐唔到呢？」⁹鬥志？

我知道歌詞班並非樂園，大世界很壞，越來越壞，歌詞班其實可以做到什麼？歌詞班結束之後，同學離開校園之後，我只有跟極少部分的舊生依然親近，也知道他們有些會自己繼續見面，而大部分除了在社交媒體互通一些消息以外，都沒有聯絡了。鬥志？歌詞班對他們的影響？但我依然

8 〈我們不碎〉（2019），作曲：謝浩文，作詞：周耀輝，演唱：ERROR。

9 粵語，相當於：為什麼人家撐得到，我撐不到呢？

這樣的繼續，因為偶然也聽到一些同學的回應，讓我忽然弔詭地想到，大世界越壞，歌詞班也許更像樂園？

桑內特回想芝加哥貧民區的經驗，認為社群之於鬥志，就是讓區內的年輕人，即使已經走入了歧途，即使困難重重，抬頭環視四周會問自己：這，就是我想過的生活嗎（Sennett 2012: 258）？於是就有可能重新激發鬥志。正如桑內特所言，這是人人都要發出也要自己尋找答案的問題。而能夠這樣問，就是一種鬥志了。在我們經歷之中的香港，更容易出現的是：別無選擇，根本不用問。歌詞班的同學，一起分享分擔，有無助、有疑惑、有憤怒，更重要的，我認為，是發現大家都有相像的無助、疑惑、憤怒，抑鬱，發現並且相認了，也似乎容易了一點，往往可以不囿於生存，可以探索生活了。我不是說，總會如此。我是說，可能如此，偶然也真的如此，從中我更提醒自己，鬥志不是單一的概念，當中包含不同的「當下的狀態」，甚至，概念能否概括到現實的複雜？譬如說，同學真的可以完全失去鬥志啊，而有人質問鬥志、感受失去鬥志的同時，是否恰好證實了鬥志的存在？

「看見到處正淪淚 / 才炫耀我們識於廢墟」，歌詞是這樣繼續下去的。這首歌叫〈我們不碎〉。上一屆歌詞班快要舉行畢業作品音樂會，以往大多在大學會堂裡，一千觀眾左右，這一次，碰上疫情，改做KKBox Live。一如往年，我都問同學是否想為他們的畢業詞作搞一些演出，想的話，我去找資源但具體執行一定由學生自己負責，包括主題。他們選擇了〈我們不碎〉，宣傳的第一個IG post 寫著：「這一年來，你累了嗎？這些年來，你倦了嗎？心碎了嗎？想哭了嗎？不要緊的，放膽哭吧。有我在，我們都在。」

也許不算躁動，是凝聚，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什麼是美好生活，佛洛依德說：愛與工作；而桑內特補充了：社群。假如美好生活本身就是一種政治、一種權力的重新分配、一種對所謂現實的抗衡，那麼歌詞班也許就是當中的實踐，實踐一起維持著鬥志，堅守著

信念，支撐著大家，即使只有一個學期，也可能更長遠。¹⁰實踐，我想起英語中的“practice”，實踐也是一種練習。

《我們不碎》是這樣結束的：

城遇過 天黑黑 天光光
分散再共聚
盛世的奇蹟 如明星
伴渴望散在天空會不碎
永不碎
我不碎
你不碎

引用書目

- Chow, Yiu Fai. 2019. *Caring in Times of Precarity: A Study of Single Women Doing Creative Work in Shanghai*. London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Foucault, Michel. 1974. “Michel Foucault: An Interview.” *Impulse*: 50-55.
- Kuipers, Giseline. 2013. “In praise of doubt: Academic virtues, transnational encounters and the problem of the public,”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7(1): 75-89.
- Littler, Jo. 2017. *Against Meritocracy: Culture, Power, and Myths of Mobil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Markovits, Daniel. 2019. *The Meritocracy Trap: How America’s Foundational Myth Feeds Inequality, Dismantles the Middle Class, and Devours the Elite*. New York: Penguin.
- Sennett, Richard. 2012. *Together: The Rituals, Pleasures & Politics of Cooperation*. London: Penguin.

¹⁰ 我跟一些畢了業的同學繼續有往來，其中一些萌生了意念，想搞同學會，2019年正式成立，叫「周耀輝歌詞班（一世唔畢業）同學會」。